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上）	阎 淮
【史实辨析】	文革：只反清官，没反贪官	顾 土
【研究动态】	年轻一代根本不懂什么是“文革”	金大陆
【劫后反思】	幸好现在我们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	邓晓芒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上）

· 阎 淮 ·

引言

“清华，工程师的摇篮”“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两个口号，决定了清华学子的共性：刻苦学习知识和坚持体育锻炼。身为工程物理系04班班长的我，当然更为突出，不必赘述。我的个性——大公小私的人生观和极左教条的世界观，则需稍费笔墨。

小学语文课本有篇讲述苏联卫国战争中，堵枪眼英雄马特洛索夫的童年故事。老爷爷说：“由于你的存在，使别人更幸福”，对马教育极大。这也成了我终生的座右铭。雷锋的“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更是我的行动指南。例如：

大学生粮食定量30斤，一半大米白面细粮，一半玉米面粗粮，同宿舍的南方同学对早餐的玉米面粥还能勉强下肚，对正餐窝头则难以下咽。我把自己的细粮票和他们的粗粮票对换，让他们慢慢适应窝头。手表和自行车当时是奢侈品，我的则是全班的公用品。你去火车站接亲戚，手表戴上；他到北大看老乡，自行车骑走。我的逻辑——爹妈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我的一切都是爹妈给的、当然更是人民给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所当然。我的想法——我比雷锋差远啦！

下午课后的体育锻炼，竞争性的球类活动比枯燥的田径运动更富有趣味性。我分派同学去借球，僧多粥少，有时很不幸，球借光了；有时更不幸，借到最后的球，场地已被占满。我决定自力更生。父母每月发我20元“学资”，交完伙食费还剩5元零花钱。我每月省2元买个球，3个月下来我们班阔了，集体所有制的蓝排足三大新球凑齐了。我们再也不用排队去抢借全民所有制的旧货。有球斯有地，各种球场任我们优先挑选。

1964年暑假，毛主席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批评了教育工作，与我的极左观念不谋而合。尽管清华也挺左的，但是比我中学母校北京101中右多了。我怀念101、不满清华，大学期间一直剃101的招牌光头就是明证。

大一时，我的极左言行与校方发生两次不大不小的冲突，它对我们双方都影响深远。其一、北京日报发表赞扬清华的文章，校广播站反复广播。系总支组织学习讨论，我说：“这就像有人夸我几句，我写在日记上，反复当众朗诵一样。”其二、大一下学期，校教务处发到班上许多宣传材料，让同学送回中学母校，动员高三同学报考清华。我把一大包印制精美的宣传品原封不动送回，对教务处领导说，“中学毕业生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或就业）’，你们不应该干扰他们。”

大二上学期，组织通知我，65年12月25日星期六，开会讨论我入党。我郑重严肃地要求延迟一天，在中国的“圣诞节”、毛主席生日的星期天举行。当时七天才休息一日，谁愿放弃？我有情有理的要求当然被无情无理地拒绝。一个高班党员说，“星期日开会？异想天开！表决你入党时，我肯定投反对票！”吓得我够呛，提心吊胆好几天。25日的支部大会上，按照惯例我还是被全票通过入党。那位高班党员说：“入党日期，你以后就填写12月26日吧，没人追究你。”

文革初，校党委某秘书揭发副书记艾知生，“破坏党的阶级路线，反对干部子弟阎淮入党”。这时我才知道，艾知生得知我入党后，对我系领导大发雷霆：“念日记、退材料的阎淮？这种简单化的小教条也能入党？一年的预备期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不改正就不能转正！”八十年代广播电视部的艾部长多么左，可是当年他还嫌我左，可见我当时真是太左了！这么左的人当然要欢欣鼓舞地迎接极左的文革了。

一、反校党委保工作组

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天然接班人——我们干部子弟（除父母已受冲击者外）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欢欣鼓舞跃跃欲试，准备全身心投入这场“兴无灭资”和“防修反修”的伟大战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伯达和康老（我们这样亲切地称呼陈伯达和康生）是我崇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江青阿姨更是伟大领袖的亲密夫人。我决心在他们的间接领导下，把文革进行到底。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了，身为“中干子弟”的党员，我既不可能是群众领袖，又不甘于“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毛泽东语）。不甘寂寞的性格决定我成为一个小弄潮儿。

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些许夸张，但是形势瞬息万变确是事实。因此，前三个月我用“大事日志”的形式，重点回忆当时的思想和言行，即我的想法、看法、说法和作法，有关的背景尽量简要。（部分背景资料参考邱心伟和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

1、当了三天造反派

5月，蒋南翔校长在全校报告中，一再把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批判和教育改革，并强调学生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因为蒋的提法与毛主席的谈话精神不符，我很有看法。在讨论会上，我说：“这是抹煞阶级斗争，是矛头向下，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6月1日，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批判北大党委的大字报。蒋南翔当天表态：“清华与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教育改革成果巨大。”我私下议论：“清华是更高级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2日，清华出现一些批评蒋5月报告的大字报。同学说：“这和你的看法一样，还不冲出去？”我回答：“我是预备党员类似中农，上不如正式党员，地主般的财大气粗；下不如党外群众，贫农般的无所顾忌；我这一亩三分地的预备资格，说没收就玩儿完。”——为了政治生命，谁没个人考虑？我按兵不动，以静观动。

3日，校党委组织反击，一大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南翔”的大字报贴出。据校方统计，支持党委与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是一万对七百。艾知生在党员会上说：“57年反右用了两个月，这次反击只用了一个下午。”我暗自庆幸，未轻举妄动，躲过一劫。

4日，一些盲动的同学被迫检讨，说自己“第一炮没放准”。我同情安慰他们：“和57年不同了，一张大字报打不成右派。”

5日清晨，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和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等贴出《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革》的大字报，震惊全校。蒋南翔反应及时，上午立即召开全校大会，认真检讨并表示要积极主动领导运动。下午党委乘胜追击，组织“你这几年的成长说明了什么？”的讨论，以证明其一贯正确。还让实习工厂的师傅写拥护党委的大字报，用“工人阶级说话了”压制反党委的师生。对这些做法我极为反感，但是还想“补台”，就通过组织系统向上反映：“这哪是‘主动领导运动’？完全是积极压制运动，赶快改弦易辙吧！”

6日，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党委又布置“小批评、大拥护”的大字报，以求“反蒋”和“保蒋”的大字报基本平衡，制造“革命”气氛。如前所述，文革前我一直对清华很有看法，最近一系列文过饰非的小动作更让我齿，我忍无可忍，于是——

7日，我和阎承志、顾逸东、王国力等物0的四名干部子弟团干部，贴出我在文革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为什么？》，揭露批判党委为压制运动而采取的各种阳奉阴违的卑鄙做法。“反蒋”同学贴出“清华的聂元梓站出来了！”的大标语，广而告之。（从此，我在文革中的“亲密战友”都是干部子弟党团员。）

8—9日，反对我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由于我们四个“中干子弟”的家庭背景不硬，故反击力道极强，有骂叛徒的，有指责“你由极左沦为极右”的，还有警告“你预备党员别想转正了！”但是，坏景不长——

2、被工作组重用并整了人

6月10日，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校，接管权力。蒋南翔停职，校党委瘫痪。清华进入了近两个月的工作组时期。

11—13日，全校范围内，掀起上揪大小“黑帮”、下批众多“保皇派”的大规模自发性群众运动。（黑帮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皇派指保黑帮的群众，这是当时《人民日报》定义的正式用语。）系里同学抢不到校级大黑帮，就把系领导和支部书记等小黑帮，以及一些辅导员和学生干部等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出现谩骂推搡等野蛮行为。我本性心慈手软，又和这些“小黑小保”们关系不错，当然义不容辞，便挺身而出制止诸不文明行动。我也算“革命造反派”，说点不太革命的话，还管了点用。（30年后，

贾春旺部长的秘书说：“你当年保护过老干部。”我答：“贾只是副科级小吏，我是保护哥们朋友。”）

14日，工作组为了结束基层的无组织状态，各班选举文革小组，系里选拔文革委员会。我文革前较左、6月初反蒋、近日挺文明，是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皆表现优异的“三好学生”，加之本人成份党员、家庭出身干部，可以说是“五好青年”。工作组舍我其谁？我于是成为班和年级核心组长，工物系文革领导成员兼系纠察队长。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领导我们进行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文化革命，我当然完全拥护、充分信任。加之，工作组的领导都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局长，和我们的家长一样，有种天然的亲切感。我由旧清华的班干部升为工作组的系级学生领导，官大了，错误也将大了。

15日，在工作组和我们各级文革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揪斗乱象迅速得到制止，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杂文被禁止。清华园恢复了平静，运动正在纳入正轨。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16日，工化系三年级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批评工作组：“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你们不许。你们举起先立后破的大棒子压制群众！”

17—18日，支持和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都不少。我当然反对蒯的观点，运动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工作组就是党。但是工作组没有组织反击，我也按兵不动。

19日，薄一波副总理来清华看大字报，在大礼堂前与蒯大富辩论半小时。蒯重复他大字报的观点，薄最后说：“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不相信？”不管蒯信不信，副总理的话，我信！我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工作组。

21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正式参加清华工作组。（19日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之子、我系“文革主任”李黎风就告诉我此事并让我保密，我偷偷透露给几个同年级的干部子弟朋友。）哇，毛主席把她都派来了！我更积极了。

6月24日，工作组在大礼堂召开与蒯大富的辩论会。蒯仍然坚持他的观点：“工作组掌权了，他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叶林说：“蒯大富是牛鬼蛇神，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主席台旁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使我平生唯一一次整了人。大会主席是贺鹏飞和李黎风，工物系“出身好”的多，可靠！李让我带领系纠察队在主席台维持秩序。工人出身的朋友王克斌，被我分配到台口负责安排发言者上台。下面是他在《华夏文摘博客》的回忆：

“辩论会上蒯大富历数工作组的错误，叶林不能以理服人，只是以势压人，激起了我的义愤，于是我自作主张阻止左派上台发言。辩论会后，我连夜写了一篇小字报，批评工作组粗暴蛮横，打压革命群众。第二天，我找了班上的同学，争取他们签名。左派阎淮怒目圆睁，恶狠狠地说，‘你放毒！’他平日与我关系不错，这张小字报，把我俩从此摆到了对立面。”我现在不记得“怒目圆睁恶狠狠”的细节，但是被整者对挨整的情节，肯定比整人者的记忆深刻清晰。以我当时的心态，这应该是事实。

随后的一个月，工作组力图把文革纳入历来的政治运动的模式：开始整人了，清华开展了“反蒯运动”。王的回忆可见一斑：“围剿蒯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对蒯派分子隔离审

查。班上同学关系不错，没人对我落井下石，整的手段相对轻些，我还有人身自由。班里开了批判会，要求我彻底检查。”批判会当然是我主持，“手段轻”也是整人呀！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要把这个阶级兄弟从蒯大富的反革命营垒中挽救出来，即所谓的“治病救人”，其实是无病整人。工作组检讨时，说是“整错了人”，我后来认识到不只是“整错人”而是“整人错”，我犯了大错误！

7月6日，蒯大富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反蒯运动取得巨大胜利。

7月22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和关锋接见蒯大富，谈话3小时，表示支持。清华形势急转。

3、见到江青和毛泽东

7月25日和26日两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到北大参加群众大会。我事先得到消息，提早占据有利位置。陈伯达和康生都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让我大吃一惊。接着江青讲话，她首先说：“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激动得像见到毛主席一样地使劲地鼓掌，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接下来令我“巨吃一惊”的一幕发生了。江青带着哭腔“痛说家史”：“北大的张少华，看毛岸青精神不正常，就强迫他和自己结婚。我和毛主席从来就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陈伯达走到江青背后，和她说了什么，被她一把推开。江青又开始数落主席长子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刘松林。越讲越激动，嗽的一声就哭开了。我们都傻了，不知是否应该鼓掌或者喊口号。顷刻之间，我对江青的印象逆转，由伟大夫人变为家庭怨妇。她把家庭琐事家丑外扬，太有损伟大领袖的伟大形象了。我对毛主席有多热爱，对他老婆就有多讨厌。

7月27日，中央决定撤走工作组，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激增，我们保工作组的也不甘示弱。继6月初写“反校党委”的大字报后，我贴出文革中的第二张大字报《工作组的成绩是主要的！》。

7月29日，在人大大会堂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要求有各种观点的人参加，我作为“保工作组”的代表与会。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先简短讲话，刘少奇的长篇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后两头。开始他说：“刚才恩来和小平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其实周、邓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派工作组的事，没引人注意。现在刘一再强调“中央决定”，并拉出周和邓见证，与四天前我亲耳聆听陈伯达说“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形成鲜明对照和巨大反差。清华同学在大会堂一楼前排，我看得清清楚楚，与四天前毛夫人絮絮叨叨令人不解的惊人之举一样，毛本人也有沉默不言、更令人费解的更惊人之举：

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语音未消，还没来得及收起讲稿走开时，毛泽东突然从后台闪现。毛疾步行走带出的风，把刘的讲稿扇到地上，毛没有理睬刘，径直走到舞台前沿把刘撇在一边。刘十分尴尬，弯腰捡起讲稿，摘下眼镜退到舞台后面，和周邓等人站成一排。毛泽东向学生们挥手，我们边热烈鼓掌、边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万众欢腾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盛夏时节，首长们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袖衬衫和灰色长裤；只有毛仍穿着深灰色中山装，脸色发青、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微笑。这与我七年前，国庆十周年游行时，看到天安门上和蔼可亲的他判若两人。毛始终一言未发，任凭欢声雷动，竟自转身走向后台。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徐志摩的《告别康桥》的首尾八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少奇与恩来（徐诗：‘作别西天的云

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发一言即拜拜（原诗：‘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情此景，毛的肃然与刘的茫然，半个世纪后，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与七年前也判若两人，从戴红领巾的傻小子初中生长成为能思考（不敢说“会”思考）的党员大学生。在感到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思索：这不像预先安排的接见群众，也不是大会议程的一个节目，就这么突然露一面、绕一圈，老人家意欲何求？二十天后的“八一八”，我从天安门城楼下来，看到新的领袖排行榜，恍然大悟：那是刘少奇的下马威！

二、清华红卫兵总部委员

1、清华红卫兵成立

“8月4日上午，全工物系工、贫、干子弟会上，我们一、二年级十几个干部子弟不同意成立贫协，决定不管高年级，自己成立红卫兵。高班干部子弟听说后同意了，下午开大会成立工物系红卫兵。晚上总理报告后，很多人又觉得不该成立红卫兵，思想不统一，红卫兵名存实亡。后来徐沙（二轻部长徐运北之子）和林梅梅（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女）向我们骨干传达：总理秘书对他们说，总理不同意成立贫协，对红卫兵还是支持的。于是我们决定还是要红卫兵，但是人数精减了，其中干部子弟占很高比例，领导全是干部子弟，我们觉得这样可靠。

8月中旬，刘菊芬（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召集在附中开了各系红卫兵领导会，我系去了五个，会上讨论了形势，决定联合行动。最后决定各系派一人组成联络组，统一步调。工物系就派汪致远（其父是文革后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回系后，低班红卫兵不干，他们力量强，就换成了我。8月19日全校红卫兵大会，宣布总部成立，联络组就成了总部，清华红卫兵也就算正式成立了。”

（67年初因炮打中央文革成为反革命，我在3月15日的小字报检查中的第5页交待如上。检查贴出后，除遭遇众多大字报批判外，在其上还有许多批语，典型者如：“坦白为上，总是要人打屁股是不行的！拒不交待死路一条。”等等。为保存众批语，某夜晚，天黑风高无人之际，我把小字报揭下留存。日前清理资料，偶然发现50年前的真迹史料，摘录于此，引为旁证。）

需要补充的是：8月4日成立的工物系红卫兵，各年级选一人，组成6人联络组，实际是我负责。中旬自控系刘菊芬通知我，开全校红卫兵联席会，每系只能去5人。我说服关系较好的一年级的联络员不去，二至六年级的5名联络员与会。会议决定各系选一人，组成“红卫兵校联络组”，将来公开时再称“总部委员”。汪致远推我，我不干，说汪比我年高望重、见多识广。刘菊芬最后决定，由她熟悉的、同是高年级的汪担任。我假谦虚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实的活思想却是：“工物系高干子弟云集，有彭真、李井泉、林枫、安子文、叶飞、耿飚、邱会作、徐运北等高干的子女，以及更多的副部长和少将的孩子；我这个中干子弟在高干子弟主持的组织中，难展手脚。”下午，回到系里传达会议决定，红卫兵们、特别是没有联络员与会的一年级同学，认为汪太稳重温和保守，坚持要我任总部委员。他们去刘菊芬处聚众闹事反映民意，我就如此这般、勉为其难地当了清华红卫兵总部委员。当时，校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由各系文革组长组成，负责人是贺鹏飞和刘涛等，我系是李黎风、数力系是后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我与他们接触较多。）占了原清华书记办公的“甲所”，我们红卫兵总部占了隔壁校长办公的“乙所”，经常一起商量研究，真是“哥俩儿好、一家亲”！

8月4日晚，清华万人大会，叶林代表工作组检讨错误。总理讲话强调：“要把主要矛头指向黑帮。”很多同学听出总理与中央文革的调子不一样，有一些人写条子给总理，要求播放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录音未果。会后贺鹏飞对我说，总理那天告诉他“今后由中南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指导清华的运动”。

5—6日，少数同学要继续批判工作组，多数人认为工作组的检讨可以通过，要求转入批判校领导。

7日，王任重指示“临筹”根据总理讲话精神，提出《八七建议》：“根据多数人意见，不再辩论工作组问题，尽快批判校领导。”

8日，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发起“八八串联会”，反对《八七建议》，要彻底批判工作组。“八八”重要成员（67年成立的“清华四一四”的一把手）沈如槐说：“显然，‘八八’的宗旨与总理讲话精神背道而驰。”（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21，时代艺术出版社，香港，2004年）

9日上午，我们保工作组者，成立“八九串联会”，赞同《八七建议》，不再批工作组，尽快批黑帮。在总理与中央文革之间，我当然倾向总理。

10—15日，清华两派各行其事，各批其人，各有“皆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八八派”开会批斗了工作组的三位组长，经委副主任叶林、冶金副部长周赤萍中将和林业副部长杨天放；大字报猛烈批判自称“普通组员”实为工作组顾问的王光美。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于公，他们少数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期望通过批判上述四人，直捣最高层的“走资派”。于私，他们大都被工作组整过，越批工作组，越显其正确。我们“八九派”批斗了几个校党委副书记。我们以干部子弟主导、以工农子弟为主体的多数派，希望批判只局限在校内局处级的党内中下层。王任重告诉我们，叶林的检查稿是总理秘书和叶共同起草、总理过目的。于公，我们当然害怕深批工作组，批到派工作组的少奇、总理和小平，动摇中央领导层。于私，工农子弟是工作组“反蒯”的主力军，否定工作组就否定了他们。干部子弟不会因工作组的垮台，而失去其政治地位。因为批工作组，批不到我们的爹妈，父母不倒子弟不垮。我们可自命大公无私。

2、周恩来与我们亲切座谈

8月16日晚，周总理召集“临筹”、“八九”和“八八”三方负责人座谈。因为前双方基本是红卫兵的干部子弟哥们，利益和观点完全一致，名义是三方，其实是两派。工作组时期，我们“代表党”整对方。近期，虽然“中央文革”暗地支持他们，但我们人多势众，还是压迫他们。双方势不两立，很难坐在一起，现在坐在一辆大轿车里，自然要争个我是你非，文明说是辩论，俗话就是吵架。我方的两个组织的头头都是各系一名代表组成，当晚能找到的也有十四、五人；“八八”总部一共才四、五人，都来了；3：1的比例，我们依然是人多声高、以势压人。双方一路从清华园吵到大会堂，在等待时也不罢休，直到21时总理进来。

总理与我们一一握手，让每个人介绍自己和家长的职业。轮到我时，总理问：“哪个怀？”我套近乎：“淮安的淮，我生在那儿。”他亲切地说：“我们算是同乡！”当我说父亲在物资部时，总理又问：“是阎某吧？”我没有惊讶，因为听父亲讲过——他在国家计委

时向总理汇报过工作，几年后到物资部又汇报时，总理还能叫出他的姓名。我当时对总理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

随后我们让总理先指示，总理说：“先请你们谈谈对清华运动的看法和建议。”半个世纪后，我不可能一字不差地复述总理的原话，但是“请”字肯定有。在总理雍容大度、温文尔雅的伟人风度感召影响下，同学们都和刚才判若两人，我们用最冠冕堂皇、最绅士文明的语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不乏绵里藏针地（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时的用词）打击对方抬高自己。总理讲话时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了稀泥，让我们双方都高兴地认为他支持了自己。让我们不高兴的是总理最后批评我们不该吵架，“我在走廊里就听见你们吵了，要求同存异，你们是组织的领导，要给下面的群众作团结的好榜样。”我印象较深的还有，亲耳听到总理在其它场合一再讲的他的出身问题。“我出身是官僚地主，父辈败落了。我出生于剥削家庭，但背叛了这个家庭，是不肖子孙，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党是讲出身成分，但重在现实表现。”我感觉他是对我们干部子弟讲的，是对“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的婉转批评。在大会堂吃完夜宵，晨4时总理又单独见了临筹成员。回清华的路上我们不再争吵，可能是总理教育的成效，也可能是“饱了发困”，大家都昏昏欲睡。

3、“八一八”上天安门

17日凌晨，周总理在座谈会结束时，通知我们次日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当天夜晚清华的几千学生集合出发。

18日凌晨，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东边。

6时，贺鹏飞突然通知我：“你们系可有5个人上天安门。”我拉上顾逸东、王国力和物九的金东锡等，与清华“临筹”及“八九派”的骨干共50人，和全国各地的1500名学生一起，在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带领下，走上天安门城楼。

7时，毛主席走过来接见我们，大家都热血沸腾，幸福激动地大喊：“毛主席好！”

7时半，大会开始，陈伯达主持，林彪、周恩来和学生代表讲话。

8时，游行开始，百万学生通过天安门。

9点半，建国后首次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带着众领袖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走动，他不断地挥动军帽，向我们致意。经贺鹏飞的点拨，我注意到刘少奇离毛泽东远远地站着，面色阴郁不言不语。当红卫兵要给他戴袖章时，他什么也没说就用右手把袖章往下拉扯。

11时，游行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后，已经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主席，又走过来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我也幸福地和老人家握了手，确切地说是触碰到他那宽大温暖柔软的左手。

年轻的我在天安门上站了5个多小时，已稍感疲惫。但是主席老人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仍然意气风发毫无倦意。这无疑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动员令，从这天起，学生变成了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

次日关于这个集会的报道中，刘少奇的排名果然由二降为八。徐沙历来语言幽默刻薄，他对我说：“刘涛过去进中南海，对卫兵伸出食指和中指，表示二号家的。今后可要伸出食指和拇指，同样是两个指头，但只能表示是八号的家属了。”我觉得刘涛挺可怜，经常私下安慰她；在“临筹”和红卫兵的联席会上，我照样尊重她，请她发表意见。毕业前听说她和土建系的才子万润南恋爱了，我为她高兴并祝福她。

1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正式成立，我也就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的总部委员。

4、结识陈元、宋克荒

20日，上午清华红卫兵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走走形式，下午立即转入打黑帮，准备批斗蒋南翔。我和“临筹”负责人带队去高教部，凭介绍信领出蒋。在回校路上，我们车队被一辆小车拦截。车上走出两人，说中央不让揪斗蒋南翔。我不客气地说：“哪个中央，刘少奇的吗？”前面英俊的大鼻子气势汹汹地喊：“周总理的中央不行吗！”我顿时软了。临筹的人还坚持要带蒋回校批斗。后面的文弱书生慢条斯理地说：“周总理来电话不让批斗，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还听谁的？”众人无言以对。我顺势说服大家，交出蒋，让他们二人送回高教部。我们回到学校，只好把“斗蒋大会”改成“斗蒋誓师大会”了事。

不打不相识，我就这样结识了自控系一年级的的大鼻子宋克荒（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子）和二年级的书生陈元（党中央副主席陈云之子）。文革开始三个月了，刘涛和贺鹏飞等隔三差五地联名写大字报，积极介入并影响运动，联合署名少则七八个人，多则十几条枪，都是各系的高干子弟，但是从未见“超高干子弟”的陈元和宋克荒之名。“临筹”和红卫兵共二三十个头头，象鄙人这种等闲之辈都混进去了，也没有陈宋二位的身影，以至于交友甚广的我都不知道清华有此两人。初交时，总见仪表堂堂、豪爽大气的宋，站在衣着朴素、彬彬寡言的陈前面，我还以为陈元是宋克荒的跟屁虫。深交了，才发现仗义执言出头露面者宋、深思熟虑关键决策则陈。至交后，他们影响了我后二十年的生活轨迹。

5、“八二四”事件

“八一八”后，毛泽东“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私下流传，学生们思想大解放。清华出现大量批评领袖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少量其他人的，可以说除毛泽东外中央领导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校外群众大批涌进清华，把这些反动的大字报传抄到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我忧心忡忡。

22日，清华反工作组的“八八派”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贴领袖的大字报较多，我们保守派中，也有人贴了。

22日晚，周总理冒雨参加清华万人大会，针对批评领袖的大字报说：“中央的问题，在中央全会上已经基本解决了。贴大字报，必须是增强团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总理讲话的精神我特认同！他淋着雨不让给他打伞的平易风范更令我敬仰。

23日，校内批评领袖的大字报和校外观看传抄者都急剧增加，最让我愤慨的是《周总理8.22讲话是个大阴谋》等攻击总理前一天讲话的大字报。我们红卫兵总部通过王任重，向中央紧急反映事态的严重。

黑暗的八月二十四日降临了！

晨5时，陈伯达在北大说，给刘少奇提意见可以写小字报，大字报要贴到室内的“内部馆”。我们如获至宝！

上午，“临筹”和红卫兵在清华“甲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形势商议对策。贺鹏飞拿出“高91班”孙某某的被制止未贴出的给毛主席写的大字报底稿，我们义愤填膺。会议决定采取强制行动，处理“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此决定通过常驻清华的王的秘书，征得王任重的同意。（有回忆文章说，是王指使我们干的，我没有确切证据。）

中午，“临筹”广播，希望把大字报贴到内部馆。有人问我，内部馆在哪里？我答，不知道，管它呢！

下午，清华附中红卫兵要求外校人员离校，封锁校门。

14时，按计划，我们总部委员分别秘密通知本系红卫兵分散到附中集合。我私下让我系的红卫兵先用大标语覆盖住自己写的批评领袖的大字报。

15时，十个中学的红卫兵被清华的汽车拉到清华附中。同时广播，让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退出附中，否则责任自负！

16时，清华和附中及外校共12校红卫兵，在附中召开誓师大会。贺鹏飞动员：“清华有一股妖风，我们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首次感受贺的鼓动才能。

17时，12校红卫兵2000余人从附中跑步进入清华（我带领工物系约百人），封锁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同时广播《最后通牒》，勒令作者一小时内撕去自己有关领袖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后果自负。我们还广播了《安民告示》，它除了语气强硬外，还提到“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破四旧”的风暴中，此时此地“纪律和注意”能起作用吗？）

18时，对批评首长的大字报拍照。同时在贺鹏飞指挥下推倒“二校门”。

19时，几乎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贴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清华园笼罩在（红色？白色？）恐怖中，史称“清华八二四事件”。

6、我的严重错误

8月24日下午5点半，12校红卫兵控制形势后，清华派出所负责人来到大礼堂前的“指挥部”。他说，家属院中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很多，应该顺势彻底清理。贺鹏飞和刘菊芬让我去了解详情。到了照澜院派出所，我才知道：清华园里大中学的师生2万人，家属3万人；其中戴“地富反坏”帽子的几百人，派出所可随时管教；（右派归单位管理）还有几百个“残渣余孽”，派出所平时不宜轻举妄动，请我们重点清理。我回去汇报讨论后，决定晚饭后行动。

晚8时，在派出所设立“破四旧指挥部”，我和所长共同负责。各系红卫兵陆续到来，由民警和居委会的大妈指引，到“重点户”去抄家。我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都是大学生，当时可能有、但指挥部未发现打人和“贪污”行为。有同学提出要抄“走资派”和“学术权威”，所长对我说：“他们今天倒了，明天可能又起来，咱惹不起，还是整

死老虎保险。”我对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和理工科的各种权威，还是有点感情的；对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就不留情了。

据《清华文革亲历》48页记载，查抄出“子弹、刚开刃的刀、北洋军阀中将军服等”。我记得还有大量解放前出版的“反动书籍”和印有“国民党国旗”的各种证书，好像金银财宝不多。查抄的物品堆满了派出所的两三间屋子。我们主要是带回“赃物”，“坏人”让居委会纪录在案，以后严加管束。一个例外是，我高中同学郭某的母亲曾在国民党军队医院任职，在她家发现一些子弹壳，人赃并获被带到指挥部。她说是儿子在工厂实习时的劳动纪念品，我见是熟人让放了。（多年后我已忘却此事，郭见面还感谢我，令我羞愧不已无地自容。）午夜前抄家结束。

当时我认为抄家和批斗是文革题中应有之义的革命行动。文革后认识到，这是侵犯人权，是犯错、也是犯法。最近为写此文，看了一些清华师长的回忆，得知他们当时被毒打的情节。我更感到清华红卫兵罪孽深重，我作为总部委员应该向所有被我们虐待的师生和家属真诚地再说一声——对不起！

刻有“清华园”三个字、古典优雅的二校门是1911年清华建校时的校门。1933年，清华扩建，修了西校门，原校门便成为了“二校门”，是清华标志性的文物建筑。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二校门，就在那晚被我们清华红卫兵彻底毁掉了！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出拉倒二校门的具体情景，以为是老年痴呆。日前听王克斌说那天他在现场，想找我劝阻，没找到，还挺奇怪。现在确认，其实我在干另一件坏事——抄家，一个人不能同时在不同之处干两件坏事，尽管当时我很想！克斌还说，你没参加毁二校门，这段的“我们”应改为“他们”。我不改！尽管“毁门”没有事前讨论、是临时起意（否则爱凑热闹的我不会缺席），但事后我也赞成，同样有责任！文革中杀人与毁门都是对公民和文物最彻底的消灭，人死不能复生，文物不可复制，同样罪不可赦，都应受到法律严惩。在清华，杀人者坐牢，毁门者无恙！若现在谁再毁掉颐和园的重要文物，不杀也得判个无期。我们可以上推领袖下卸群众，现在谁也不可能再追诉惩罚我们。但是我的灵魂还在被煎熬被惩处！现在的二校门是文革后复制的。根据《文物法》，我们不但犯了错，而且犯了法，是清华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现已查实，北京在“红八月”打死万人，抄家近10万户，逐出京城12万户。主要具体施暴者应该就是以我们干部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我在2011年曾写道：“（文革前）社会上有多少个阶级阶层，学校中就有多少种“子弟”。在众多子弟中，被经常自称和他称的只有“干部子弟”——这个肩负特殊重大使命的群体。革命干部要打击阶级敌人，干部子弟就要帮助出身不好者，与家庭划清界线。革命干部要改造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就要帮助高知子弟改造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愚昧荒唐时代，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这是‘年年、月月、天天’重复的残酷悲惨的现实。”（《回忆与反思、感恩与忏悔》，香港《明镜月刊》，2011年9月期，P114）十七年的毒树，结出文革的苦果。文革伊始，干部子弟又充当“扫四旧”的打手，重现28年前，前辈纳粹党卫军“水晶之夜”的“悲惨世界”。清华校友中对“彻底否定文革”有异议，但“彻底否定老红卫兵”应该是共识。在中国的“水晶之夜”，近百万皇城“贱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无家可归之时，我还沉浸和陶醉在上天安门、毁二校门，抄家破四旧的神圣感和幸福感中——可耻可悲！

曾参加党卫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屠杀的体制。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更何况我还是干过坏事！

8月26日,《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清华红卫兵(刘菊芬执笔)的文章《清华园必须大乱》,被公认是中央对“八二四事件”的肯定。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说“红卫兵把旧世界震动了,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老寄生虫都被红卫兵揪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和杀人武器被红卫兵拿出示众。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我当时更自认“抄家”和“毁二校门”的正确。上有中央支持、下有恐怖支撑,清华成了我们“清华红卫兵”的一统天下。当然,还有沈如槐讲的因素:“清华红卫兵斗黑帮是符合总理指示精神的,也得到清华大多数师生的认同。八八派没有听总理的话,仍然揪住工作组不放,是中央文革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P30)当时,要在总理和中央文革二者之间选边站,群众大多选总理而弃中央文革。几天内就有万余名师生员工报名参加清华红卫兵(当时在校学生一万、教工六千),我们精选八千,号称“八千子弟兵”。《清华文革亲历》第53页记载,“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和清华红卫兵联合斗黑帮,清华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必须承认大方向错了,并要服从清华红卫兵的领导。”我们自认为的正义和正确,所表现的蛮横和霸道可见一斑。

八月底至九月初,清华红卫兵和“临筹”组织多场阶级教育会(如请全国劳模、掏粪工时传祥等工农忆苦思甜)和批斗黑帮会,双方各出一个头头主持,我曾分别与贺鹏飞和乔宗淮同台主持,文革后我们仍有私人情谊和工作交往。我在红卫兵总部中与刘菊芬和数力系的高晓红、在外系的红卫兵中与工化系的刘延东等三位鸽派女性观点同、私交好(因观点一致也因我本性懦弱),至八十年代仍继续来往。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开始了“大串联”,中央文革支持北京造反派到各地去“炮轰省市”。为建立红色中国许多革命先烈都流血牺牲了,先烈们的那些流了血没牺牲的革命战友,即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要“摊上大事了”、要倒霉了!我们红色的革命接班人,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义不容辞地保护革命老干部。你说是“保爹保妈”,我一不在乎二不服气,反正中国基层不能乱。八月,我们“老兵”以保工作组的名义在北京保了众多派工作组的中央部委领导。九月,我们要主动出击,造反派可以到外地串联“造反”,我们当然应该去串联“保皇”,能保一个省算一个。我向红卫兵总部请假,说咱们红卫兵已掌控了清华,我要到西南去保皇。贺鹏飞和刘菊芬都很支持。

(未完待续)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史实辨析】

文革:只反清官,没反贪官

• 顾 土 •

这些年,贪官层出不穷,贪腐无处不在,因为对腐败的强烈不满,于是,很多人便将目光转回到文革。在网络的各种文字表达中,你会发现,将文革看作是反腐败的革命,把文革当做是批斗贪官的舞台,甚至形容文革是廉洁的温床,已经成为一种语言习惯。

可惜,30多年前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与反贪毫无关系,不仅如此,文革还是以反对、批判、清算历史上的清官而拉开大幕的。

## ◇ 用清官海瑞为文革祭旗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海瑞，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300多年前以刚正不阿而著称的人物，被拿来为文革的祭旗。

姚文元在文章中关于清官是这样下的结论：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做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做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自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尤其是清官问题，顿时成为报刊讨论的对象。关于清官是好是坏的争论，观点无不针锋相对，折中的也有不少，有些观点之极端，现在的人恐怕根本想象不出来。

极端的观点认为，清官都是统治者的忠实走狗，是统治阶级出现危机时出来维护反动统治的。这种人比贪官酷吏更阴险更坏。他们的行动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抑止农民革命的作用，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时，连吴世昌、唐兰、郑天挺、冯友兰、朱光潜、翦伯赞等学术名家也纷纷站出来说话，其中不乏将清官一概打倒的论调。

其实，早在1965年之前，关于清官就已经成为报刊讨论的问题，其中196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第5版署名星字的文章《论“清官”》最为著名，文章说：“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维护法定剥削权利的一种势力。从根本立场上说，他们是和人民对立的，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忽略这一点是不应当的。这种维护法定权利的势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为几种各不相同的“清官”类型，有的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有的是封建制度自我调节的工具，有的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他们的特点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因此，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都是不对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给这一历史现象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这篇文章，如今看起来已经够极端的，可是，在1966年却因为没有更极端而难逃被批判的命运。

对《海瑞罢官》、姚文元的文章、清官问题，之所以还能讨论一段时间，恐怕与彭真等人的态度有关，他们在1966年的《二月提纲》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

不过，时间到了1966年4月，随着彭真等人的下台，情形急转直下，从此，讨论终止了，一边倒的大批判开始，尤其是工农兵的介入，更加重了批判的火药味和肆意性。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农民看透了“清官”的反动本质》里称：广大贫下中农对“清官”的看法同吴晗完全相反，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揭露了“清官”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级本质。《兴国县工人农民批驳〈海瑞罢官〉》一文介绍，在海瑞曾当过一年多知县的江西兴国县，工人、农民和老革命同志座谈《海瑞罢官》，大家义愤填膺地对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在《工农兵纷纷来信来稿，痛斥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报道里说，工农兵一致指出，所谓“清官”，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他们的头子有意布设的大骗局。辽宁省锦州市女儿河造纸厂工人冯清江来信说：海瑞为封建地主阶级谋福利，给皇帝老儿卖命，他是剥削阶级的人，绝不会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包头市内蒙古一机厂工人范连仲来信说：“不管‘清官’、‘贪官’，他们都是官，他们的本质都是反动的。海瑞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家伙。”

解放军某部战士王玉卿来信说：“我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清官’。‘清官’是反动剥削阶级抬出来的，是笑面虎，是腐蚀剂。《牢牢抓住印把子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江苏省部分职工批判吴晗》还报道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邀请部分工人举行了一次批判吴晗的座谈会。工人们都认为：“清官”、贪官，都是一样的大坏蛋。在批判清官时，除了海瑞被批倒批臭外，包拯，也就是包青天等一批历史上的清官，都遭到了清算和否定。

1966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署名徐逊的文章《吴晗的“清官”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应该说，这为清官彻底定了罪：

吴晗的“清官”论，歌颂“清官”“缓和阶级矛盾”使历史得到发展，鼓吹“清官”能给人民带来眼前利益，吹捧“清官”是统治阶级“明智派”。这种论调，宣扬了“合二而一”阶级调和；号召人们为了目前利益而忘了根本大计；要人们向反动统治阶级“明智派”乞求“恩赐”，是一种反对革命的阶级投降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批判《海瑞罢官》，不仅是批判吴晗、针对彭真、反对有人为彭德怀翻案，同时还要彻底颠覆旧的历史观，所以，1966年开始的讨伐，最终扩大为对海瑞的批判、对所有清官的批判，炮火越来越猛，涉及面越来越广。就像当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一样，最终演变为对武训的全面清算。这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1966年6月1日，由陈伯达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称：“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对海瑞的横扫最后还扫到了海口的海瑞墓，墓被捣毁，尸骨被刨出来游街示众，最后拖到广场一烧了之。

◇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一场思想运动

在批判、否定清官同时，贪官仅仅作为一个理论上的附属品或清官的对应品，在各类批判清官的文字中也不断出现，不过，说的都是历史，对现实中基本没有具体所指。此后，可能由于现实中更多的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有更多的“大毒草”需要猛烈的炮火，所以，历史上的清官问题，包括贪官，也就退出了舆论中心，基本不提了。

一直到1975年，贪官才如狂轰滥炸般突然间再次出现在全国所有报刊和广播中，这不是因为现实社会中产生了贪官，或是文革需要反贪官了，而是因为评《水浒》、批判投降派运动的来临。

贪官再次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完全在于涉及《水浒》的两句话是最高指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一旦有了最高指示，所有的文章就不能不援引，这是盛行了几十年的官样文章的基础笔法，更何况那是个一切围着最高指示打转的年代。

“只反贪官”，是一种否定的语气，也就是说，《水浒》宣扬的“只反贪官”在当时是被批判的，这部小说成了反面教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一直被引用到1977年，其间，“四人帮”被逮捕前，这句话是为了“评《水浒》、反投降派”，而“四人帮”被逮捕后，这句话则是为了揭批四人帮“利用评《水浒》搞阴谋诡计”。

整个文革，以批判清官开路，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收尾，清官遭到彻底否定。纵观古今，横观中外，恐怕还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所以说，文革思维确实是一种极致，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建设完全有别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以致从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水平等都远远落后于苏联和东欧，而且还自认为别人都是修正主义，只有自己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

#### ◇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属于一个层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前者就是“五一六通知”，后者即为“十六条”，在这两个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我们看不出反腐败和反贪官是文革的目标。

1975年，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相继发表，这是经历了将近10年的文革后，对文革思想的深入阐述和系统总结，应该看作为文革的纲领性文章，但在这两篇文字中，我们也找不到文革与反贪官的直接关联。文革的罪名五花八门，有上百种，帽子满天飞，但就是没有贪官这一项。在文革中揪出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中，有人集多种罪状于一身，如刘少奇、林彪、陈伯达、陶铸等人，也没见到有贪官这一项。

贪污问题，虽说在那个时代也有提及，包括姚文元的文章就提了一句反对贪污，可是，这不是文革的主要目标，如果是主要目标，那就成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犹如1975年对待“走后门”那样。文革期间，《人民日报》每次提及贪污都是在宏大主题里稍稍挂上那么一句，类似套话，有的时候是表决心，有的时候是回忆，有的时候是表现在大批判文章里，而且都会与盗窃捆绑在一起，叫贪污盗窃，前面或后面，肯定还加个投机倒把，总是将“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凑在一块儿说，可见，贪污当时和盗窃、投机倒把属于一个层次，因此，矛头所向往往往是最基层，比如公社、大队、生产队、供销社、批发店等。即便偶有所指，也是指会计、保管、采购之类，不属于官的范畴。

投机倒把这个词，现在老一代人已经陌生了，新一代人不知道，其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很长时间内，特别是文革，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不过，这个罪名若放在今天，估计

多半人都逃不过去。此外，“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也是语录，引用语录是文革期间贯穿所有场合的铁律，所以，尽管贪污没有具体所指，但在各类文章中，贪污还是高频率出现，就是因为人人在叙述有关没关的问题时都必须引用这段语录。

文革期间，报刊还常常揭露外国的贪污，国际新闻的贪污一词出现频率远远超过国内，揭露贪污主要是为政治与外交服务的，与哪个国家的关系紧张了，要反对哪个政权或政治势力了，于是，贪污就成为其罪状之一。其中揭露苏联贪污的最多，连后来被定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也不例外，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贪污问题几乎被中国舆论揭露了一个遍。仅在人民日报上就有南越、印度、泰国、印尼、缅甸、柬埔寨、老挝、南朝鲜再加台湾，有的被称为仆从国，有的被说成走狗。南朝鲜的朴正熙，也就是朴槿惠的父亲，被形容为傀儡，其政权是一个法西斯政权。

#### ◇ “一打三反”对付的是“反革命”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从此，“一打三反”运动开始，虽说这次运动明确表明有反贪污的内容，但从头至尾，运动的中心目标都在于打击所谓“反革命”，这是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的又一次滥杀滥捕，冤假错案横行，仅2月至11月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人，逮捕2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上自杀之路的。

1970年，人民日报的文章中也不时提到反对贪污，尤其在报道经济战线大好形势中，都会出现“一打三反”，有的文章是笼而统之的大批判、表决心，但也有很多篇文章在介绍本单位的经验时提到揪出了一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虽然没说具体情况，可这些单位都是基层的公社、批发店、商店，所以，分子大概也脱离不了保管、会计、采购员之类。而且，这些分子统统都被归入到反革命的行列，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0年1月14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就发表湘才的文章《打击敌人就是保护群众》，其中说：

“正当我们狠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怪论，说什么“搞经济问题，是矛头对准群众”。我们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角落里刮出来的一股阴风。斗、批、改越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越濒于死亡，就越是要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混淆视听，妄图搅乱阶级阵线，干扰斗争大方向，借以蒙混过关，这是毫不足怪的。

我们必须及时揭露批判，粉碎敌人的阴谋。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我们的矛头是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对准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这些家伙，是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他们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有什么资格充当群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矛头对准这一小撮，正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是为了保护广大的人民群众。”

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其目标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而贪污仅仅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社会下的一种行为，这是文革的思维，所以，依照文革思想，只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贪污问题就能随之解决。文革时代、前文革时



代，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就是政治运动，从始至终都没有进行过廉政制度建设和司法建设，而政治运动的特点就是人治，人治的结果就是冤假错案横行。

其实，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贪污就已经非常盛行，贪污本身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和修正主义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始终没有创建出真正能抑制贪污的有效制度。目前世界上，反而是那些被认定为典型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拥有一套反贪污的严格制度和法律，并且行之有效，可以将贪污、贪官压缩到最小限度。

如今的贪污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横向比较，包括与香港地区比较，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就能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大可不必往回看，既不必去效法古代，更不必怀念文革。

如果效法古代，那就必须承认今天的社会与古代没什么两样；如果取法文革，那就必须取消市场经济、严控商品经济、恢复人民公社、闭关锁国、重新施行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再次实现票证购物，摧毁现今的公检法，并且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我想，这样的时代，任谁都不愿意重来一遍吧？你的房产、你的财产、你出国的权益、你私下表达意见的权利，你会放弃吗？

□ 原载《共识网》

~~~~~

【研究动态】

年轻一代根本不懂什么是“文革”

• 金大陆 •

◇ 寻找革命之下的血与肉

《非常与正常》，以一种很少见的研究视角，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文革中如何艰难运转

“你看我的手。”金大陆笑呵呵地伸出胳膊，上面有很多小伤口和划痕。“我就戴着口罩到处爬梳资料。我有一屋子的史料，我每天都埋在资料堆里面。”他说。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金大陆在文革最癫狂的时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度过的。一方面那时他只是初中生，另一方面他是“黑五类”的子女，这让他没有资格更深地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当时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非常信奉的。”他认真地对记者说，“到了后来我的思想就全反过来了。”

那是林彪案公开之后，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他这样回忆。从那之后，他对高层政治产生了严重的恐慌，对文革开始质疑。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发生时，金大陆虽然人在上海，但是一直挂念着北京的情景。“那个时候，文革还没完全结束，我就决心要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金大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时隔35年，如今已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的金大陆，写出了这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这套67万字的书分为上下两册，详细描述了十年文革期间，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有对市民的衣食住行、粮油蔬菜供应以及猪肉是否凭票购买的记录；也有一片革命化纯洁化呼声下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书中详细的史料和数字更揭开了文革“赤胆忠心”口号掩盖下潜藏的腐败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大家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私自开发地下生产线加工毛主席像章并大肆贩卖，另一些人买来各类报纸，经过剪贴再送往外地隐蔽的地下印刷点造出地下文革报刊，雇佣上百报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文革时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地下性交易这些都存在。绝不是像有些人怀念文革说的那样，文革不存在贪官。”金大陆挥挥手说。

目前，许多涉及高层的文革档案尚未解密，而学者对于文革的研究从未中断。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有关文革的中文文献书目接近一千种，但绝大多数都是谈的文革运动本身或局部的个体经历。而《非常与正常》一书中则对于运动和口号之下日常生活做了详尽的记录和描述，这是很少见的研究视角。它让人们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文革中如何艰难运转。

出版《非常与正常》只是金大陆出版计划中的第一部，随后他还将沿着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方向陆续出版两部后续作品。涉及文革期间的住房问题：房屋如何被强占和置换，文革中被扭曲的两性关系，文革中的自杀数字等等……

“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一听到文革就想到‘造反有理’！”金大陆一边比划一边唱了一句，“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那样的，人们还在生活。革命之下有很多涌动的生活暗流还在继续。我就是想把那些血肉的东西写出来。”

◇ “现在研究运动史和政治史的环境不太方便”

中国新闻周刊：众多文革史研究都是从革命运动本身出发的，你为何决定从生活史的角度研究文革？

金大陆：做文革史是一个长期的追求和计划。并不是说我专门在做文革社会史。我是文革的亲历者，在文革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长期在这方面追求，也在等待。

从长项的研究讲，做文革史，第一，作为学术准备是大量资料收集和积累；第二步按理说是做政治史和运动史；第三步才是更长线的做文革中的社会史、生活史、教育史、外交史等等。但是现在研究运动史和政治史的条件不成熟，第二步现在做不了，我就把社会生活史提前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关于其他部分的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你也在做？具体是怎么把生活史的资料分类出来的？

金大陆：对，那是很长期的一个工作。我一直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要做一个一二百万字的大文革日志。写十年间的每一天上海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在做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个人的年谱。这些都是要长期准备。

这次的《非常与正常》出版也有一个机缘。有一套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要出版，文革十年也纳入其中。我就暂缓了文革日志和年谱的工作，把手里搜集的全部资料一页一页捋了一遍，把文革运动本身和生活史资料分开，再把生活史部分按章节和专题分。第一部分是

牵涉到千家万户的运动，比如上山下乡、破四旧和抄家；第二部分是文革期间衣食住行、婚姻等日常生活。再有就是和生活相关的，比如毛主席像章的收藏、买卖以及文革时期的小报和地下报刊。

◇ 强压多大，反弹也就多大

中国新闻周刊：先说衣食住行，你很细致地列出了粮油、蔬菜、猪肉、水产品的供应情况。这些内容在之前的文革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就好像文革中生活是不存在的。而最后你得出的结论是，文革中粮食蔬菜生产基本是丰收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有什么不同反应吗？

金大陆：要写生活就必须要有衣食住行，虽然经济史的一些数字比较枯燥，但是很有用。当时的粮食蔬菜基本丰收并不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而是说，恰巧十年间除个别地区外，都风调雨顺，没有极端天气，这恰巧保证了文革能一直进行。第二，武斗乱了两三年，实际上广大农民还是要生产的。第三，到文革后期也提出说，要把生产搞好才体现我们是革命的。所以，应该说，文革十年总体供应是短缺的，但是上海的生活是在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的情况下维系的温饱水平。

我写了这些以后，有些人确实批评我，说我是说“文化大革命好”，说我对文革的描述太温馨了。其实绝不是那样，我只是从史料出发，不想掺杂那么多意识形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出上海十年文革中买猪肉是不凭票的？这和大多数人的记忆完全相反。

金大陆：和我的记忆也相反，我也很吃惊。但是事实，史实的偏差需要纠正。在文革期间的上海，猪肉是不凭票的，有时还打折出售。这和全国保上海有关，也和毛泽东说“粮多、猪多、肥多”鼓励养猪有关。在文革之前发过肉票，文革后也发过。应该说，猪肉供应充分，是那个时期国家管理和计划经济极端强力运作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探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大串联的时候对比了两地的不同，而且上海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城市，这是什么原因？

金大陆：上海开埠最早，工商业比较发达，还有租界地等等。上海人比较精明、理性，上海讲“动口不动手”，动手就没理了。这是潜意识里的，文革时期也没有被冲破。这和其他城市非常不一样，北京整个城市都被革命热情燃烧了，上海还是有年轻男女手挽手在苏州河畔谈恋爱。

另外，关于军械性武斗的问题，指的是使用枪炮。除了刚才说的上海人文化历史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在文革一开始，上海警备区有一个命令，所有的单位民兵的枪支全部封存全部收缴；再有一点，上海在文革期间也有派别冲突，但是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一统天下，他们主宰着局面，没有势均力敌的两派，相对来说稳定。虽然也有武斗打死人，但是用棍棒长矛，而不是动枪动炮。

而北京不一样，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当天，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人1772人，上海被打致死的11个人，其中三个人还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这反映两个城市的区别。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之后对于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也很看不惯，也经常进行揪斗？而且，按照你的统计，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率仍然是一条正常曲线？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就看不惯上海小青年谈恋爱那种资产阶级的香风邪气。晚上开车到黄浦江边、到和平电影院等晚场电影散场，抓到那些拉着手的小青年就打。虽然这样，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结婚率统计大致还是一条正常的曲线，这说明在文革严酷的环境中，人们还是努力营造生活，这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离婚率又是一组非常残酷的数字，十年间上海只有6489对离婚，平均每天不到两对。这绝不是说文革期间有冰清玉洁的革命情感，而是当时宣传离婚意味着生活腐朽，人们也担心离婚连累儿女。而那些离婚的很多都是因为社会政治原因而非感情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革命的状况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压抑，这些压力会寻找出口，革命的口号对这些也是震慑不住的吧？

金大陆：文革中很多人往纯洁方面去靠拢。反过来，压强多大，反弹也就多大。这个反弹是非常扭曲的反弹。1966年，红卫兵动不动就剪掉一些人的头发、衣服，当时都认为是纯洁、赤诚的行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飞就上街了。各种服装、发型都出来了。还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泛滥了。这个是一种反弹，对性压抑的强烈的放大。这种人也被打击的，但是会顽强地表现。1974到1976年团市委在上海太阳下山后在外滩、人民广场、淮海路都设点观测的，看裙子长短、穿泡泡纱的有多少。

虽然当时没有公开的卖淫场所，但是上海的女青年跟海员，发生性买卖关系的也不少。电影院门口有一阵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内裤，就是因为有地下卖淫。到后来压抑到极点就总爆发了。有两个标志事件是：1972年的国庆节期间1号和3号发生的事，一个在外滩，一个新华电影院门口。流氓围着漂亮女孩子嬉笑、调戏，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剥光，几百人围观。之后很快查清楚首犯枪毙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这样的事年年发生。

◇ 研究文革，应该从史料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因为他们觉得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贪官都被批斗没有人敢贪污。但是你的统计却表明文革中处处仍有腐败。

金大陆：当时想拥有毛主席像章的人都赤胆忠心的，他们交换或拿钱去买。他们怎么知道会有那么多倒卖、地下生产像章的。有的人赚钱把自己家的房子都造起来了，有的是坐飞机倒卖。有人做铝锭、有人做冲床、有抛光的、有买卖的，这是个地下生产链。当时集邮票集糖纸全部封掉了，收藏的理念全部集中到像章了。当时的像章有多少就卖多少，这里面就有很多漏洞可寻。

上海还有地下报刊。利用革命需要和自己单位的方便，印地下报纸。永安公司到美术馆，500米路，每天街道两旁都是叫卖声。各种报纸2分一张或3分一张。有人就去买十张报纸，回家剪贴，拼成四版变成新的一张报纸。上海的印刷管理很严，他们就买了白报纸，到江苏宜兴和无锡的乡镇印刷点，印几千上万份。杭州、南京的当时就批发，再到上海来，2分3分再卖掉，雇佣一百多个小学生做报童。这样弄一份报纸可以赚三四百块钱。

那些在菜市场工作的人也利用职权贪污，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的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到好几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对于文革研究的分歧也逐渐开始明朗，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如何确定你的研究角度？

金大陆：中国现在搞经济建设。我觉得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逐步解决了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它的历史问题，该承担的会承担、该解释的会解释，孙辈为爷爷背这么大的历史包袱没有必要。现在文革研究出现种种倾向，有文革浩劫论、文革灾难论……海外的研究有人提出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等等。种种论述是要往两个极端拉。一个是“集体犯罪说”，还有一个是随着现实的变化，有人对文革有很多怀念——一些老干部和下岗的工人，他们认为现在贪污腐败的贪官，要是文革老早被揪出来斗死了，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西方的理论界呢，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人类反腐一个很终极的探讨。

我一直非常强调的是史料为本，学术至上。今天的文革研究者，有的为自己辩护，有的倾注自己的情感。我肯定也有感情，但我不是派性派别的。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作为一个学者，做这个事情，就应该从史料出发。

□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16日

【劫后反思】

幸好我们现在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

• 邓晓芒 •

一、关于知青下乡

1、作为知青，经历了从保守封闭到改革开放的成长经历，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应该如何做好新一代青年的教育与培养，把这种宝贵的人生财富传承下去？

答：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死亡的边缘到逐渐复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能够清楚地看出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出路、活路何在，看出我们为什么一度走入死胡同。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亲身经历，比如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下乡、四清、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所展示出来的活力，来对下一代言传身教，戳破他们被别有用心地灌输到天真头脑里面的各种谎言，特别是告诉他们凡事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以及对照现实生活来思考，不要盲从。

我们曾经被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害苦了，要教育下一代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至少要有清醒的头脑，这在今天社会发生如此巨大变迁的环境下已经有了良好的条件，不像我们当年，说一句真话都可能面临杀头。一个父母曾是知青的家庭里面应该充满着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与现在的年轻一代是相通的，不存在真正的“代沟”。

2、邓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九零后，对那段历史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历史是有惰性的，我想知道那段历史对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又如何对我们这一代未曾经历那段历史的人发生作用？

答：其实，对那段历史知道得不多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从那时以来直到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的连贯性就体现在我们身上和你们身上，只要有所耳闻，马上就能够豁然贯通。

比如说，文革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今天当然已经是日薄西山了，顽固坚持的人不多；但那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依然如故，很多人总想找一个新的权威来供自己膜拜，依托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来干我们当年在文革中干的事情，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总是倾向于用暴力对待同胞中那些弱者，以壮大自己卑微的灵魂。这甚至不能说是文革的影响或“余毒”等等，而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劣根性。

3、您认为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城市大学生，是否应该在大学期间或者毕业后，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我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是种历史性的错误运动，但也客观上造就了您那代人的意志品质和对生活的感悟。

答：我不反对现在的青年出于了解社会或丰富自身阅历的目的而主动去农村接触农民底层，去工厂和社区也可以，我甚至认为这是有志于学文科的大学生的一段必要的经历，当然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这和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没有关系，那场运动绝对是欺骗性的、压迫性的，我们可以说它客观上造就了某些好的东西，但这不能算在上山下乡的账上，就像曼德拉在27年的监狱里悟到了种族和解的道理，不等于说每个人都要去坐一次牢。大批有才华的青年被这场运动生生毁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只是极少数，这是我们民族的劫难。

但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一定要去农村或边远地区，就你身边每天都生活着底层的百姓，上演着底层的苦难。甚至你的同学，也包括你自己，都有可能成为底层的一员，由于家庭困难，由于疾病缠身，由于飞来横祸，由于能力差异或性格特别，都会导致生活中的沉沦，都是你和你的同学们回避不了，也难以视而不见的，蚁族和蜗居的命运在等待着很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如何面对这样的命运而顽强地活着，这就是对你们这一代人的考验，所需要的忍耐和毅力，恐怕不亚于我们当年在乡下所经受的，这也正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和鼓励的地方。

4、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有利有弊，站在不同阶层的角度，对利弊的分析也不同。作为没有这种经历的当代学生，我觉得知识青年下乡可以给广大农村地区输送科技文化知识，给农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而且广大农村的生活场景也是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源泉，文艺离不开群众而且为群众服务。不知道这个想法，您觉得有没有道理？为什么？谢谢！

答：你还相信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文化知识，可见你只从官样文章中了解这场运动。我们当年号称“知青”，其实本身并没有多少知识，初中、高中生，认得几个字，会做算术题，灌输了满脑子的阶级斗争观念，最初一两年搞了点扫盲工作，引进了一点良种，也常常是失败的。

我们更多地是在当地农业技术干部的带领下强行要农民做这做那，搞些劳民伤财的“科学实验”，破坏当地生态和植被。再就是举办了一些文艺汇演，教农村青年唱红歌、跳“忠

字舞”，到了后期，就是偷鸡摸狗、无所不为，被农民骂为“日本鬼子”。这些事情，不做也罢，说起来还有点脸红。你说的那些道理，都是当年骗我们下乡的道理，我们已经醒悟了，想不到你们倒前仆后继了，幸好现在我们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

5、坦白讲，我个人一直对前些年社会上的一些人以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时代的自恋式的怀旧，感到悲哀。明明是苦难，非要罩上无比幸福的外衣，其实也许是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摆脱痛苦的回忆。但这就给很多年轻人造成错觉，似乎文革时代是多么的圣洁。我的问题是，现在上山下乡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步入老年有的甚至已经作古，请您看如何能让本文这样的反思，不只是在小众群体中共鸣，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于人生的思考？谢谢您！

答：我对此不抱过多的奢望，能够反思的人在中国注定只是小众，绝大部分人都是昏昏噩噩、稀里糊涂地就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得像植物一般，却自以为辉煌无比，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我只是觉得，不说白不说，不是为了“唤起民众”，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经历的时代。凡是经历过的苦难，都应该留下记忆，不能白白地消逝。如果年轻人能够从中得到某种感悟或共鸣，这就是国家之幸了，我乐见其成，但不是刻意追求的。

6、下放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知青及城市居民的到来，给当时处于相对“愚昧”的农村带来文明的气息，也为后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铺下基础。凡事一分为二为好。不应以当年受难而后悔，亦不要以现在……责故人。

答：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无是处”的，要“一分为二”的话，连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都可以“一分为二”，比如说它带来了今天“抗日神剧”的繁荣。

就我本人来说，我是上山下乡的“受患者”，本应该高调宣扬“青春无悔”，但我觉得那是一种缺乏反思的心态，而且有些自私。

为了那一点点“文明的气息”，就要把上千万正在受教育的青年扼杀在野蛮中，让整整一代中国人未受正规教育，你以为这两方面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吗？

二、关于哲学研究

7、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的关系如何？康德在纯批（“纯粹理性批判”）里是怎么调和或者说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以这个问题开头，在当下面对转型期的中国，我看到很多人强调经验主义，尤其以顾准先生那本《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六弟以他的文稿取得名字）开始，当代学者也有很多人强调经验主义，我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强调有个试错的过程（或者用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我想问试错过程是不是已经包含了理性建构的过程？在当下理性主义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康德的综能能给当下的中国什么启示？最后还想问个问题，作为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自感哲学的入门艰难，作为哲学家能够给爱好哲学的青年什么建议？

答：康德说，一切知识都是我们用先天的理性法则去统摄经验材料而构成的，两方面缺一不可，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很好地调和这两方面，但基本的思路是对的，理性和经验不可偏废。

顾准先生很多话都说得很精彩，但唯独这方面我不同意他，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混淆了西方的“理性”和中国的“天理”，把大跃进、文革这些荒唐事都归咎于太讲“理性”。其实这哪里是什么理性，而只是以毛的“革命路线”为代表的现代天理，而天理是不动脑子、不讲逻辑，只凭内心情绪体验和信仰的，是立足于盲信甚至迷信之上的，是非理性的。

现在为了反对文革的假道学而把西方的理性主义一起反了，这是理论上的极大失误，它阻碍了中国人对自己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毫无前瞻性，只会盲人摸石头，永远过不了河。

对哲学有爱好的人，不要直接从哲学原理入门，而要从哲学史入门，我讲的是西方哲学史。恩格斯有句话说得好，学习哲学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哲学史，别无他法。人类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能够在哲学史上留下名字的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你能想到的哲学问题，前人早已经想过了，还有更多你没有想到的，前人也想过了，以他们当自己的老师，比任何哲学教师都强。

当然，学完了哲学史并不等于你就是哲学家了，那时是否能够自成一家，要靠运气和造化，可欲而不可求。但学哲学不是一定要成哲学家，而是要具备全面的哲学素养，这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必须的。学习哲学是为了“成人”。

8、邓老师您好，现在人权已经成为了道德的制高点，甚至成为国家相互攻讦的工具。而另一方面，人的权利的过分强调，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生存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现代语境与后现代语境混杂的社会中，人权的内涵是什么，人权的边界又应该是什么？

答：中国人理解人权非常困难，有语言上的和文化上的障碍，现在中西在人权上的对攻，基本上是对人权理解上的错位，是鸡同鸭讲的一场混战。

我们所理解的人权，也就是所谓“权利”，还是从中国传统的“人欲”中推出来的，大体上是一个“民生”概念，首先是“生存权”，再就是“民利”（现在叫“人民利益”），老百姓理解的权利则无非是让他们得到“实惠”。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到明清引起反弹，讲天理即人欲，人欲即穿衣吃饭，人所共有，天经地义，但仍然反对私欲。

西方人权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强调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虽然与利益有关，但不仅仅是利益，而是人格独立和人的尊严；而这种独立和尊严的前提是公平和正义，人格尊严不是要凌驾于别人之上，而是与一切他人平等，这就必须由正义来摆平，而正义体现为法。所以，西方的权利（英文 right，德文 Recht）同时有“公正（法制）”和“权利”两方面的意思，这个概念是无法准确翻译成汉语的。

例如，弗格森案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布朗，是否侵犯了人权，不但要看是否让对方受到了伤害，而且要看这种伤害是否合法。而我们国内的舆论就只看到谁受到了伤害，而不去讨论合法性程序，这就是一种文化错位了。如果只要有伤害就是侵犯人权，那么为了维护人权就可以把警察和法律都取消了，那不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哪里还有起码的人权呢？

所谓对人的权利过分强调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也是从“人欲”或“私欲”来理解人权所推出的结论，因为只要真正是人的权利，那就是在法制前提下的利益诉求，怎么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呢？生态失衡恰好是无视人权的结果，而不是强调人权的结果。可见中国人要理解西方的人权概念，还要走很长的路。

三、关于社会现实

9、媒体上提到的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讨论，我想这可能是正是由于老人们缺少反思的原因，我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是不是本来就缺乏自我反思的基因？您对注入解剖自我、反思历史的基因有什么样的思考？

答：媒体上总是喜欢耸人听闻，什么“坏人变老了”，好像只有这一代人是坏人，他们变老了。其实再过五十年来看，恐怕是更坏的人变老了，按照目前年轻人的道德现状来看，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普遍的道德水准越来越下降，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而这种普遍的道德下降，当然与普遍的缺乏反思有关，但不只是老人们缺乏反思，年轻人同样也缺乏反思，我们整个民族都缺乏反思，几千年传统中都是如此。只不过传统中国道德相对比较适合于传统中国的国情，适合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很深的反思。

而目前这种国情已经不存在了，有了新的国情，于是我们的传统道德就失根了。我们现在还不知死活，拼命在鼓吹儒家伦理救中国，拒斥西方传来的普世价值，这就是在阻止中国人获得一面反思自我的镜子。但是整个时代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靠老祖宗那一套东西再也混不下去了，所以我提出当代的要务是进行中国第三次启蒙，所谓深化改革的前提就是深化启蒙，舍此前提，一切都是空谈，而空谈是误国的。

四、关于启蒙

10、您觉得中国的思想启蒙在被救亡中断后，现在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当代思想启蒙，应该从哪里起步，如何起步，才能着眼未来，凝聚共识，理性前进？

答：当代中国启蒙的任务不是老调子重弹，而是深化和落实。深化是理论上的深化，要澄清一些一百多年来一直混淆不清的理论问题；落实是要结合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赋予理论以现实的内容，而不像以前那样停留于唱高调和隔空呐喊。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现在不是由一小批知识精英去“唤起民众”，而是现实生活中民众在向知识分子发出呼唤，要求我们去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侵权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去击破那种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强辞夺理。这种强辞夺理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天经地义的“理论体系”，它常常使当事人感到屈辱而无可奈何，其实就是一套极左的意识形态模式，这套模式是到了在新思想和新现实的合力冲击下解体的时候了。

11、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如何平衡饭碗和理念？如果一种启蒙受制于某种利益，那么这种启蒙还是启蒙吗？如何看待当代学人犬儒化？

答：今天的“体制内”，经过文革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一定的理论探索空间，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成为驯服工具和喉舌。

当然这点空间也很有限，它基本上只限于与现实离得很远的纯粹理论探讨，而禁止过多地涉及现实政治问题。但我以为，这恰好歪打正着，因为中国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并不在于那些浮面的社会现实问题，而要追溯到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要从根本上颠覆几千年来传统思

维的惯性，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而是一种长期的、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奠基的工作。

一个学者如果有志于做这种工作，我认为就不存在饭碗和理念的冲突，他的理念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只要学问做得好，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要发财则休想。一个启蒙思想者首先应该对自己在这方面启蒙，即不是为吃饭而思考，而是为思考而吃饭。当代学人的犬儒化就是由于颠倒了这个关系，把思考当作了吃饭的手段、发财的手段，成了一些生意人和政治奴仆。

□ 原载《共识网》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